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文本分析 *

刘春艳 [1] 孙雨晴 [2]

[1]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2] 青岛理工大学图书馆 青岛 266033

摘要：[目的 / 意义] 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分析“新型智库”政策文本，以期为“新型智库”政策的后续制定或修改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 / 过程] 通过对“新型智库”政策文本进行编码，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结果 / 结论] 当前“新型智库”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为：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据主导，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数量偏少，并且其内部子工具使用明显不均。根据研究结果，建议：降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合理优化内部结构；提高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重视税收、金融与法规制度建设；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加强“新型智库”国际市场建设。

关键词：政策工具 新型智库 政策文本分析

分类号：C932；D6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5.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1 引言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下文中简称“新型智库”），此后，各行各业“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其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均与日俱增。有资料显示，在全球百强智库榜单中，我国入选的智库机构有 8 家 [1]。“新型智库”建设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均衡、机制不健全、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不高、影响力有限、独立性不强等缺陷。我国“新型智库”要想更快、更好地发展，亟须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也需要不断完善必要的行业规范与准则。

目前，国内学者对智库政策研究成果较少，并未形成体系，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1）别国智库政策的启示。此类研究通过分析别国发展智库所颁布的相关政策，对我国智库政策制定发挥启示的作用。例如，以德国智库政策为研究对象，探究别国智库政策带来的经验和启示 [2]。（2）智库政策影响力研究。关琳 [3] 从内参和批示两项指标入手，对我国智库政策出现的问题以及对策建议进行研究，以期提升我国智库政策的影响力。王传奇等 [4] 基于政策过程理论，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探讨智库政策影响力评价中的“唯批示论”方法，以期为“新型智库”评价提供参考。（3）智库政策文本分析。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李晓春 [5] 通过对国家推进智库建设文件的研究，发现高校和政府合作会提高智库工作效率，但仅仅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一份文件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定性分析智库政策。吴艳东等 [6] 通过对与智库相关的 165 份中央层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价值网视域下图书开放获取权益分享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TQ02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春艳，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E-mail: 1994006@hlju.edu.cn；孙雨晴，助理馆员，硕士，E-mail: s1029322214@icloud.com。

的文件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使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总结出“新型智库”意识形态和实现路径。黄小斌等 [7] 采用科学方法对我国智库政策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总结我国智库政策特点及其演变规律。通过对国外文献进行梳理可发现，目前国外学者较为重视智库对某项具体政策实施的作用研究，例如，安迪拉（Ardila）[8] 探讨了智库在多尺度复杂过程和权力互动中对快速公交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尼坎德（Nicander）[9] 探究了智库在美国安全政策环境中的作用等。此外，部分学者从政策文本的角度研究智库，例如，戈雅尔（Goyal）等 [10] 对 60 个智库知识产品的内容进行分析，对政策建议进行编码，探究政府能力、智库能力和智库自治对印度政策建议内容的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发现目前有关智库政策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可视化分析，大量研究只是停留在宏观总结，笼统地概括政策发展的趋势等，并未对政策话语进行深度分析。此外，大部分研究对象主要是从某一个政策文本对智库政策进行分析，研究深度不足，鲜有综合性智库政策的文本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新型智库”政策文本，辨析政策工具在我国“新型智库”政策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内部联系，以期提升我国政府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关注度，促进“新型智库”高效、快速地发展，也为我国“新型智库”政策的后续制定或修改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政策文本分析及内容编码

本文以“新型智库”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政策文本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秉持权威性、公开性、相关性的原则对文本数据进行数据筛选，并且不对外公开或无法查阅的“新型智库”政策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以“智库”or“思想库”or“智囊团”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截止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共收集到 879 个政策文本。由于检索是定位到全文，导致政策文本的聚焦性不足，许多政策只是简单提及“智库”，并未对其有更深入的阐释。因此，在对政策文本精读的基础上，剔除相关度低的政策文本，最终收集到 205 个政策文本。将这些政策文本中与政策工具相关的条目提取出来，部分政策条款见表 1。

表 1 政策文本（部分）
Table 1 Policy text (part)

政策序号	政策条款
1	建成一批服务国防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创新平台和高水平智库
2	加快形成测绘地理信息智库体系
3	完善民族研究专家库
4	办好全国民族研究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5	全面发挥并整合高校智库功能
……	……

不同学者对于政策文本的属性划分有不同的见解，根据现有研究经验，本文选择政策工具和产业类别两个属性对我国“新型智库”政策文本展开研究。首先，政策工具属性划分来自于罗斯韦尔（Rothwell）和兹葛维克（Zegvelk）的分类标准：供给型政策工具（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技术创新支持、信息服务共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型政策工具（政府鼓励、服务外包、贸易管制、社会宣传）以及环境型政策工具（税收制度、法规管制、目标规划、财务金融、策略性措施）[11]。其次，产业类别属性划分主要按照第三产业划分标准将“新型智库”产业类别分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金融业，开采辅助活动，农、林、牧、渔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共九大类 [12]。

为了更好地量化“新型智库”政策文本在政策工具和产业类别两个方面的使用情况，本文对 205 个“新型智库”政策文本进行了统一编码（见表 2），共得到 303 个编码。

编码格式为“a-b-c”，每一个政策文本均有唯一的编码。其中，“a”为政策文本的排列顺序编号，所有政策文本的序列号为最终编码的首位数字；将产业类别按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农、林、牧、渔服务业，开采辅助活动，交通运输，以及仓储邮政业，金融业的顺序进行编序排号 [13]，所得的序列号作为最终编码的第二位数字“b”；将政策工具按照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进行排序编号，作为最终编码的第三位数字“c”，从而形成最终编码。

表 2 我国智库政策工具编码表

Table 2 Coding table of policy tool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政策序号	产业类别	政策工具	编码
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供给型	1-3-1
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供给型	5-4-1
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环境型	8-3-3
4	农、林、牧、渔服务业	供给型	9-6-1
5	农、林、牧、渔服务业	供给型	10-6-1
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供给型	13-1-1
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供给型	14-1-1
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环境型	15-1-3
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供给型	16-1-1
1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供给型	17-1-1
⋮	⋮	⋮	⋮

3 “新型智库”政策单维量化分析

3.1 X 维度——政策工具量化分析

基于上述划分标准以及“新型智库”的特点，本文构建出了完整的“新型智库”政策工具体系（见图 1）。

根据前文的编码和统计分析，本文共得到 303 项政策工具，具体见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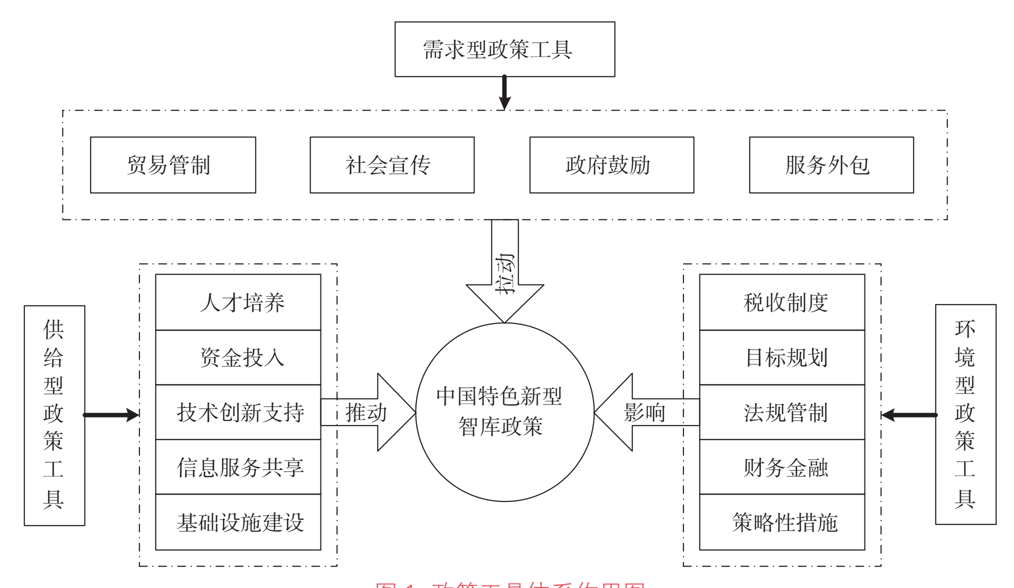


图 1 政策工具体系作用图

Figure 1 Role diagram of the policy tool system

根据编码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等方面均有涉及，且差距较大。供给型的使用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占总数量的 54.8%。其他两个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数量比较平均，分别占总数的 22.1% 和 23.1%。由此可见，我国“新型智库”政策的使用并不均匀。目前“新型智库”政策在制定措施时通常采用供给型，比较倾向于加大人才培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等方面；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较少，但需求型政策工具能够推动政策实施，环境型政策工具能够影响政策实施，二者对“新型智库”政策制定意义重大，是“新型智库”政策发展的主要助推力 [14]。因此，应加强对需求型和环境型两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才能使我国智库政策更好、更快地发展。

表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工具编码表

Table 3 Coding table of policy tools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工具类型	工具性质	编码号	总计	占比
供给型政策工具	人才培养	4-3-1，6-4-1，9-6-1，13-1-1，14-1-1，33-7-1……	79	54.8%
	资金投入	31-1-1，37-4-1，43-4-1，107-6-1，111-1-1……	20	
	技术创新支持	3-3-1，28-1-1，45-4-1，74-4-1，122-3-1……	12	
	信息服务共享	5-4-1，16-1-1，21-1-1，82-5-5，137-1-1……	12	
	基础设施建设	1-3-1，2-4-1，10-6-1，17-1-1，24-1-1……	43	
需求型政策工具	政府鼓励	7-3-2，22-1-2，32-1-2，38-4-2，42-4-2……	40	22.1%
	服务外包	75-4-2，113-1-2，231-4-2，263-4-2，273-1-2……	6	
	贸易管制	54-1-2，112-1-2，117-1-2	3	
	社会宣传	11-4-2，20-1-2，27-1-2，69-8-2，80-5-2……	18	
环境型政策工具	税收制度	—	0	23.1%
	目标规划	8-3-3，56-1-3，23-1-3，29-1-3，35-4-3……	31	
	法规管制	48-4-3，78-5-3，81-5-3，172-4-3，176-4-3……	8	
	财务金融	65-8-3，86-5-3，93-5-3，175-4-3，177-4-3	5	
	策略性措施	15-1-3，18-1-3，19-1-3，30-1-3，46-4-3……	26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数量分别排在第一位（79 项）和第二位（43 项），资金投入 20 项，而技术创新支持和信息服务共享均是 12 项，数量较少。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在建设“新型智库”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充分意识到了人才培养是“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智库与专家息息相关，智囊团需要专家学者的支持，在“新型智库”建设中需不断完善专家库，培养各领域优秀专家队伍，办好各领域骨干培训班。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发展的必要保障，国家鼓励建设各种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搭建各种研究咨询平台等，推动“新型智库”的飞速发展。尽管其他 3 个方面所占比重比较小，但“新型智库”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技术创新支持、资金投入以及信息服务共享等后续工作也需要继续加强。

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政府鼓励子工具 40 项（约占 60%），其次是社会宣传子工具有 18 项（约占 27%），而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子工具数量较少，仅有寥寥几项。由此可见，目前需求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数量较少，未来需要加强这类型政策工具的制定与完善。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子工具数量较多，分别为 31 项和 26 项，法制管理和财政金融子工具数量是个位数，而税收制度为 0。我国“新型智库”政策近年来才得到初步发展，政府十分重视目标规划和具体的策略性措施，但在法规管制和财务金融方面有所欠缺，并未给我国“新型智库”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立法保障和法律环境，特别是在税收制度上完全空缺，并无相关政策条文规定我国“新型智库”税收制度。

总之，“新型智库”3 种政策工具总体分布呈现以下情况：供给型工具数量最多，几乎占据一半比例，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约各占 20%。

3.2 Y 维度——产业类别量化分析

将经过编码得到的 303 条政策文本内容按产业编码排序，具体结果见表 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是我国智库政策涉及数量最多的一个领域，约占全部产业数量的一半。政策文本主要涉及高校智库、旅游智库、广告业智库等机构的发展规划。由于我国较为重视高校智库的发展，其作为一个“新型智库”所占数量较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是我国智库政策涉及数量位居第二的领域，占比为 24.1%。这说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关于社会智库建设所涉及的政策文本也较多。

表 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按产业类别编码分布表

Table 4 Code distribu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polic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industry category

产业类别	编码号	总计	占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2-1-2，13-1-1，14-1-1，15-1-3，16-1-1……	73	2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3-2-3，199-2-1	2	0.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1，3-3-1，4-3-1，7-3-2，8-3-3……	28	9.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1，5-4-1，6-4-1，11-4-2，34-4-1……	125	41.3%
卫生和社会工作	78-5-3，79-5-2，80-5-2，81-5-3，82-5-1……	27	8.9%
农、林、牧、渔服务业	9-6-1，10-6-1，102-6-3，103-6-3，104-6-2……	20	6.6%
开采辅助活动	33-7-1，50-7-1，142-7-2，143-7-1	4	1.3%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62-8-2，63-8-3，64-8-2，65-8-3，66-8-3……	23	7.6%
金融业	248-9-1	1	0.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位居第三，占 9.3%。智库若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信息传输，并且软件和信息技术本身与智库有众多交叉领域，因此，该领域内政策文本数量较多，我国高度重视此方面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位居第四，占 8.9%。我国倡导健康中国战略，新型医学智库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所以备受重视，发展也较快；我国亟须构建现代化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体系，社会工作智库建设迫在眉睫。因此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文本鼓励卫生和社会工作智库发展。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排在第五位，占 7.6%。政府注重加强对交通运输新型智库发展的指导，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使得交通运输的决策和智库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交通运输智库更好、更快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位居第六位，占 6.6%。政府提出建设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智库，聚焦“三农”工作中心，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开采辅助活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金融业位于所有产业中的末位，占比极低。这说明目前对于开采辅助活动以及租赁和金融业的智库政策较少，目前这几个产业领域发展较为欠缺。特别是金融业，没有与之相关的政策文本。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不仅重视智库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发展，也关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的发展。此外，卫生，交通运输，农、林、牧、渔等产业也有所涉及，也就是说，智库的发展已经延伸至各行各业，充分反映出我国“新型智库”的发展突飞猛进，并且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4 “新型智库”政策多维量化分析

如果单从一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那么无法显示政策工具和产业类别两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将上文分析的两个维度合并，对“新型智库”政策工具进行多维度分析，框架图如图 2 所示，得出的“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及产业类别二维表，如表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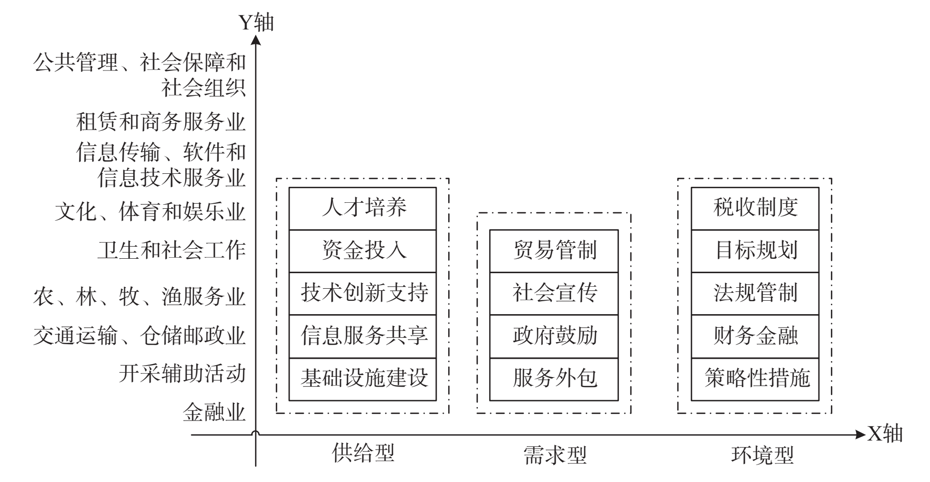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多维分析框架图

Figure 2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 of policy tool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表 5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及产业类别二维表

Table 5 Two-dimensional table of policy tools and industry categories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政策工具		产业类别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农、林、牧、渔服务业	开采辅助活动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金融业
供给型	人才培养	15	1	8	33	7	4	2	8	1
	资金投入	7	0	1	7	0	3	0	2	0
	技术创新支持	2	0	2	8	0	0	0	0	0
	信息服务共享	6	0	0	5	1	0	0	0	0
	基础设施建设	8	0	5	22	1	6	1	0	0
	合计	38	1	16	75	9	13	3	10	1
需求型	贸易管制	3	0	0	0	0	0	0	0	0
	社会宣传	6	0	1	4	5	1	0	1	0
	政府鼓励	4	0	5	19	4	1	1	6	0
	服务外包	3	0	0	3	0	0	0	0	0
	合计	16	0	6	26	9	2	1	7	0
环境型	税收制度	0	0	0	0	0	0	0	0	0
	目标规划	9	1	4	10	1	3	0	3	0
	法规管制	0	0	0	4	2	0	0	2	0
	财务金融	0	0	0	2	2	0	0	1	0
	策略性措施	10	0	2	8	4	2	0	0	0
	合计	19	1	6	24	9	5	0	6	0

4.1 产业类别视角分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中供给型工具占比较大，总体有 38 项，其内部子工具中人才培养数量最多，占 15 项，其他子工具使用数量偏少；需求型政策工具 16 项，各个子工具均有涉及，但数量均较少；环境型政策工具 19 项，主要集中于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其余子工具数量均为 0。在此产业类别的政策工具使用中，三大类别政策工具均有所涉及，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明显高于另外两种，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没有税收制度、法规管制和财务金融 3 类子工具。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只有人才培养 1 个供给子工具和目标规划 1 个环境子工具。这说明我国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关注度偏低。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多，占 16 项，最受重视的是人才培养子工具，无信息服务共享子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 6 项，没有贸易管制和服务外包子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 6 项，没有税收制度、法规管制、财务金融子工具。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所有产业中运用政策工具最多，供给型政策工具占 75 项，其中绝大多数是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有 26 项，其中政府鼓励子工具有 19 项，无贸易管制类；环境型政策工具 24 项，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居多，缺少税收制度子工具。

卫生和社会工作类的特点是 3 种政策工具数量相同，均是 9 项，数量较多的子工具有人才培养、社会宣传、政府鼓励以及策略性措施，故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拉动此产业快速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但子工具中没有技术创新支持和信息服务共享；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都较少，仅有社会宣传、政府鼓励、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子工具。

开采辅助活动产业中，3 种类别的政策工具均

较少，尤其环境型政策工具为 0。另外，开采辅助活动产业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但数量相对于其他产业也较少，仅有 3 个。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中，3 种政策工具数量相近，均较少。供给型政策工具只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有社会宣传和政府鼓励；环境型政策工具包括目标规划、法规管制和财务金融。总体来看，此产业以人才培养和和政府鼓励为主要政策工具。

金融业缺少政策工具使用，仅有 1 项人才培养子工具。

4.2 政策工具视角分析

供给型政策工具共计 166 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一半比例（75 项），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 38 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 项，农、林、牧、渔服务业 13 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10 项，其余行业均低于 10 项，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金融业仅各占 1 项。子工具使用数量由大到小排名分别是人才培养 79 项、基础设施建设 43 项、资金投入 20 项，信息服务共享和技术创新支持各 12 项。所有行业均有人才培养子工具的使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以及金融业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而信息服务共享、技术创新支持以及资金投入子工具的使用较少，许多行业是 0 项。

需求型政策工具共计 67 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 26 项，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有 16 项，其他行业均低于 10 项，并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均是 0 项。子工具使用数量由大到小排名分别是政府鼓励 40 项、社会宣传 18 项、服务外包 6 项、贸易管制 3 项。大多数行业均有政府鼓励和社会宣传子工具的使用，仅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有贸易管制子工具，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有服务外包子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共计 70 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有 24 项，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有 19 项，其他行业均低于 10 项，而开采辅助活动和金融业为 0 项。子工具使用数量由大到小排名分别是目标规划 31 项、策略性措施 26 项、法规管制 8 项、财务金融 5 项，税收制度 0 项。大多数行业均有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子工具的使用，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有法规管制和财务金融子工具，所有行业均无税收制度子工具。

5 政策工具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当前我国“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制定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超过 50%，而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数量较少；各类型政策工具均存在内部子工具使用明显不均的现象，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在政府鼓励和社会宣传子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则偏重于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子工具，而贸易管制、服务外包、法规管制、财务金融、税收制度子工具运用较少，尤其是税收制度使用为 0；各行业在政策工具运用上也存在差异，没有一个行业覆盖全部子工具使用，大多数行业在子工具的使用上都有缺失，金融业仅使用人才培养 1 项子工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降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合理优化内部结构。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对于我国“新型智库”的发展具有较为强大的推动作用，但过度使用会导致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匮乏，影响“新型智库”的高效发展[15]。因此，政府应适度降低“新型智库”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充分发挥其他两种工具的优势，使三者相互作用，协同推进“新型智库”健康、良性发展。供给型工具中可适当减少使用人才培养子工具，适当增加技术创新支持和信息服务共享子工具的使用。例如，鼓励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智库产品服务创新，扩大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以增强对智库的信息支持等。这样既可以给“新型智库”营造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技术与信息支持氛围，又可以推动“新型智库”向更高层次迈进。

（2）提高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重视税收、金融与法规制度建设。环境型政策工具为我国“新型智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和生存背景，但就目前现有政策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在“新型智库”政策中所占比例偏低，有待适当加强。另外，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最为缺失的是税收制度问题，财务金融和法规管制相关使用

情况也较少，并且没有实施的细则和奖惩办法[16]。因此，在“新型智库”建设方面，政府应当增加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制定金融财务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等，通过优化智库发展环境来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快速发展。

（3）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加强“新型智库”国际市场建设。目前，我国政府重视政府鼓励和社会宣传政策子工具，而忽视了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政策子工具，还有一些行业缺少需求型政策工具。“新型智库”不仅要发挥传统的重点领域决策咨询提供者的作用，其功能也要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也要越来越广泛，还要成为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者、政策研究人才的培养者、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独立知识精英学术和政策建议的港湾、全球合作交流的国际平台[17]。“新型智库”需要不断发挥其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争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增加影响力和号召力，需要政府鼓励、社会宣传、服务外包和贸易管制等政策子工具的管理和干预，营造健康良好的国际市场生态环境。

6 结语

本文对与“新型智库”政策工具相关的条目进行编码，分别从政策工具维度和产业类别维度对“新型智库”政策文本进行单维分析，结合 X 维度和 Y 维度建立二维分析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新型智库”政策工具制定的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另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1）“北大法宝”是本文基础资料和数据的主要来源平台，以关键词“智库”“思想库”“智囊团”搜索相关政策时，数量非常庞大，但许多政策文本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的相关度较低，为确定最终数据而进行数据清洗时可能会因主观因素遗漏相关政策文本，从而导致数据上存在偏差；（2）政策主体之间的参与合作较浅，无法达到共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故在找寻联合发文“新型智库”政策基础数据来源时较为困难，导致该部分的政策总量不足，无法呈现一个客观、充实、精准、有效的最终分析结果；（3）对于政策工具的归类，虽然遵循了科学的类别划分，但在将政策条目归类到其所属的类别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且有些政策条目包含多种类别，导致归类结果可能不完全精确。

未来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随着我国“新型智库”政策的不断发展完善，研究角度也应该不断扩展并改进。本文仅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研究框架，下一步还可以从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语境、政策体量、政策研究进展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取得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优化政策工具配置问题。目前，我国“新型智库”政策工具的使用在横向和纵向维度均分布存在不均的问题，各种政策工具在使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本文并未提及如何进行政策工具优化配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从优化政策工具配置角度入手，取得“新型智库”政策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智库．《全球智库报告 2020》发布，中国多家智库入选全球顶级智库分类排名 [EB/OL]. (2021-02-01) [2021-11-13].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1-02/01/content_77175930.htm.
Global Think Tank. “Global Think Tank Report 2020” released, a number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elected the world's top think tank classification ranking[EB/OL]. (2021-02-01) [2021-11-13].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1-02/01/content_77175930.htm.

[2] 山东省政府研究室．德国智库政策研究的经验和启示：德国经济社会政策研究方法若干重大政策设计的启示与思考之一 [J]. 机构与行政，2015(4): 58-59.
Research Office of Shan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policy research of German think-tanks: One of the inspir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some important policy designs of Germa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s[J]. Agency and Administration, 2015(4): 58-59.

[3] 关琳．新型智库政策影响力实证分析：基于“CTTI”内参与批示数据的计量研究 [J]. 江苏高教，2019(10): 46-51.
GUAN L. Empirical analysis on policy influence of new-type think-tanks[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9(10): 46-51.

[4] 王传奇，李刚，丁炫凯．智库政策影响力评价中的“唯批示论”迷思：基于政策过程理论视角的研究 [J]. 图书与情报，2019(3): 11-19.
WANG C Q, LI G, DING X K. The myth of “instruc-

tions-centric"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licy impact of think tank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process theory[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9(3): 11-19.

[5] 李晓春．高校智库建设政府不能缺位：从政策文本角度的分析[J]. 滁州学院学报，2016, 18(3): 83-86.
LI X C.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be abs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exts[J]. Journal of Chuzhou University, 2016, 18(3): 83-86.

[6] 吴艳东，米倩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32(1): 17-25.
WU Y D, MI Q Q.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2(1): 17-25.

[7] 黄晓斌，邓宝赛．我国智库政策文献的计量可视化分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 5(3): 48-57, 74.
HUANG X B, DENG B S.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Chinese think tank policy documents[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20, 5(3): 48-57, 74.

[8] ARDILA D S. Global policies for moving cities: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Bus Rapid Transit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and Worldwide[J]. Policy and Society, 2020, 39(1): 70-90.

[9] NICANDER L.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U.S. security policy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15, 28(3): 480-501.

[10] GOYAL N, SAGUIN K. Capacity, control, and content: The supply of think tank policy advice in India[J]. Policy Studies, 2019, 40(3/4): 337-352.

[11] 田鑫．论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基于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 41(3): 17-31.
TIAN X. The objectives and policy tools of func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A cas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n Japan[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20, 41(3): 17-31.

[12] 方卿．产业链分类与出版产业链的类别归属[J]. 科技与出版，2008(8): 76-78.
FANG Q.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ublishing industry chain[J]. Science-Technology & Publication, 2008(8): 76-78.

[13] 安茹．变迁与走向：我国研究生招生政策的文本分析[J]. 学周刊，2019(1): 181-182.
AN R. Changes and trends: A textual analysis of our graduate enrollment policy[J]. Learning Weekly, 2019(1): 181-182.

[14] 孙瑞英，马晓伟．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评价[J]. 图书馆论坛，2021, 41(8): 120-131.
SUN R Y, MA X W. Evaluation of think tank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Delphi method and AHP[J]. Library Tribune, 2021, 41(8): 120-131.

[15] 李人杰，王燕．新时期中美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共性分析及差异比较：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J]. 职业技术教育，2020, 41(7): 73-79.
LI R J, WANG Y.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olici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J].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020, 41(7): 73-79.

[16] 孔德意．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科普政策工具分析[J]. 科普研究，2019, 14(3): 19-25, 109-110.
KONG D Y. An analysis of policy instrument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J].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019, 14(3): 19-25, 109-110.

[17] 王辉耀，苗绿．中国智库的七大作用[EB/OL]. (2015-09-28)[2021-01-13]. https://www.hnzk.gov.cn/zhikuyanjiu/335.html.
WANG H Y, MIAO L. The seven roles of Chinese think tanks[EB/OL]. (2015-09-28)[2021-01-13]. https://www.hnzk.gov.cn/zhikuyanjiu/335.html.

作者贡献说明：

刘春艳：负责研究内容与框架设计，以及论文修改；

孙雨晴：负责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以及论文撰写。

Policy Text Analysis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Liu Chunyan[1] Sun Yuqing[2]
[1]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2]The library of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03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policy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formulation or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Methods/process]** By coding the policy text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this paper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policy tool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and puts forward some pertinent suggestions. **[Results/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is dominated by supply-type policy tools, the number of demand-type and environment-type policy tools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use of its internal sub-tools is obviously uneve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reduce the use of supply-oriented policy tools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reasonably; increas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ax, financial and regulatory systems; pay attention to the pull of demand-oriented policy tool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Keywords: policy tools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policy text analysis

收稿日期：2022-03-08 修回日期：2022-04-24